

基督新教與中國近代女子教育

郭衛東*

中西學人往往把1839年11月在澳門開辦的“馬禮遜學堂”描述為基督新教教會在華辦學之始，此乃誤說。實則，新教在華開辦的最早的較正規的學校是女校，也就是說，基督新教在華辦學是從女子教育肇始。這是一個所關非細的問題，它關涉到新教在華活動的最早路數，關涉到後來數以千百計對中國近代社會影響甚大的教會學校設辦的源頭，關涉到向佔人口半數的中國女性打開施行正規學校教育的大門，關涉到中國近代教育史的起筆。

一

這所在基督教來華傳播史和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學校便是“澳門女塾”。1834年，普魯士籍傳教士郭士立（Gutzlaff）入澳門，其夫人 Mrs. Gutzlaff 隨行，開始在澳籌備辦學事宜。初期宗旨是祇收女童，後改兼收男童。學校在1835年9月30日正式開課，有女生十二人和男生二人。其中便有後來中國第一個在美國獲得學位（耶魯大學）的容閔。其後學生陸續增加，但生源不穩，中途停學者很多，能在學校堅持兩年以上的學生便屬難得，僅五六人而已，所以，學生人數祇能維持在十五到二十五人之間。⁽¹⁾學校係小學水平，三年學制，採用英國小學課本，課程包括誦讀、英文、中文。第一年兼習地理、歷史和寫作，第二年習讀本和寫作，第三年祇習讀本。師資由郭士立夫婦擔任，後因郭士立其它事務繁忙，難以兼顧，郭夫人又聘請其侄女巴夏禮（Miss Parkers）姐妹來華幫忙，另聘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教授英文，中文課程則請中國先

生教授，還有巴倩荷馬（Miss Theodosia Barker）小姐助理。經費方面，學校先是獲得“印度與東方女子教育促進會”（The Ladies'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的支持，又獲“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的贊助（該會每月撥30元作為男童經費）。⁽²⁾學校實行免費寄宿制，提供學費、食宿、文具、衣物等。學校管理嚴格，上午授課五小時，下午集會，黃昏有晚課，晚九時就寢。每週都有中英文考試，中文每週測驗四次。如有違反校規者，予以嚴厲懲罰。對此，曾有逃學經歷的容閔留下這樣的記述：

旋命予等排列成行，巡行全校。且於晚課後，課堂中設一長桌，命七人（逃學者）立其上一小時。予立中央，左右各三人，頭戴尖頂紙帽，胸前懸一方牌大書“逃徒”，不啻越獄罪囚也。予受此懲創，羞愧無地，而古（郭）夫人意猶未足，故將懣餅橙子等分給他生剝食，使予等饑涎欲流，絕不一顧。苦樂相形，

* 郭衛東，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為2000年11月在韓國漢城召開的“中、日、韓基督教教育比較國際學術會議”上的中方主題發言，在本刊發表之前，作者作了刪節和多處修改。

難堪滋甚，古夫人洵惡作劇哉！（³）

1839年，中英關係因鴉片問題而驟形緊張，廣東當局下令驅逐英人群離華（包括澳門），郭夫人係英人，郭士立本人也身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譯員，且與英國鴉片販子有密切往來，在澳門難以立足，於是女塾停辦。這便是新教教會在華設辦最早學校的情況。

為證明“澳門女塾”是新教教會在華新設辦學堂的“第一所”，此處略加考訂。

在這之前，新教教會確曾設立過數所面向華人的學校，但其情況有別。它們是：1815年8月5日，由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米憐（W. Milne）在馬六甲開辦“一人主理學校”。1818年至1822年間，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 H. Medhurst）在馬六甲陸續開辦首間華童學校。1825年，英國婦女格蘭（Miss Grant）在新加坡開辦首間華童學校。兩年後，尼維爾小姐（Miss Nevelli，即後來的郭士立夫人）又在馬六甲開辦了五間女校；尼維爾離去後，由窩麗斯（Miss Wallace）接辦。其後，窩麗斯負責的這些專門面向華人女童的學校發展到八所。據統計，到1831年，僅馬六甲一地就有十五間面向華人的學校。（⁴）

是時，清朝實行禁教政策，中國大陸的門戶對教會關閉，教士們難以進入，祇得採取迂迴戰略，在華僑聚居的南洋發展教務，為以後入華準備條件。上述教會學校便是為此而建，它們雖然是面向華人，但畢竟不是設在中國的土地上。

鴉片戰爭前設在中國土地上的教會學堂也不是沒有。1828年中國第一位新教牧師梁發在其家鄉廣東高明縣古勞村開辦私塾，幾乎沒有多少西學色彩，即便這樣，不久，還是被當地鄉民所不容，被迫解散。（⁵）1831年，美國來華第一位傳教士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Missions）的裨治文（E. C. Bridgeman）在廣州開設了一所僅招收四至五名學生的學校，規模極小，也僅維持了三年時間，便因學生離散而難以續辦。（⁶）可以看出，上述兩校極不正規。所以，從較正規的意義上言，澳門女塾應該說是設辦在中國土地上的第一所西式學校。因為，這一時期，澳門的主權所

有在中西方都是沒有疑義地屬於中國。於此，也可洞見澳門在西學東漸和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所特有的開啟承接地位。

二

鴉片戰後，中國被迫開放除廣州傳統口岸外的上海、福州、廈門、寧波。教會學校也首先在五口地區發展起來。必須強調指出的是，新教教會在中國大陸設辦的第一所學校也是女校。箇中歷史因緣也許並不偶然。

1844年，原在爪哇馬都拉興辦女學的英國女教士愛爾德賽（Miss Aldersey）轉至寧波，創辦寧波女塾。（⁷）按：該校的成立時間還有其它說法，教會人士繆秋笙和畢範宇（F. W. Price）在1929年發表的〈中等教育的過去和現在〉一文中提出的時間是1840年（⁸），而在1993年出版的《中國女子教育史》一書則把成立時間定在1842年（⁹）。但揆諸史料，仍應確定寧波女塾是在1844年成立。（¹⁰）

那時的中國，讀書是男人的專利，他們可以博取科場贏得功名，而女子仍應奉行千百年來流行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教會人士卻千里迢迢漂洋過海來中國辦學，將女性迎進學堂，且不收取任何費用，讓人費解。又值鴉片戰爭新敗，國人對洋人疑忌極深，故而女塾開辦時，傳言極多：

認為洋人所來，一定有所取於其中，於是製鴉片啦，挖眼睛啦，煉藥水啦，便成為普遍的答案。後來，愛爾德賽想種種方法，招得了幾個學生，然而這些學生家長，還時時要受驚嚇。常常會有人告訴他們，學堂裡女學生，都給洋人弄死了，他或她就不得不又急又嚇趕到學校裡來看看那些小寶寶。（¹¹）

但流言止於智者，在愛爾德賽等人堅韌努力下，寧波女塾逐漸消除了民眾誤解，贏得了社會尊重。1845年，女塾有了十五個學生，七年後，增加到四十人。

鴉片戰後的最初一個時期也是新教教會在中國大陸興辦女子教育的起步期。各口岸陸續出現了一

些女校：1851年美國聖公會（American Church Mission）的瓊斯（E.Jones）女士在上海設辦“文紀女校”；1851年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在廣州設辦後來成為著名的“真光學校”（The Light Seminary）前身的女學；1859年美以美會（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媽標禮（Miss Porter）姐妹在福州創辦“毓英女校”；1860年英國長老會（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的仁歷西（M.B.MacGregor）女士在廈門鼓浪嶼創辦“仁女學”（當地人呼為“紅毛女學所”）。據統計，從1844年至1860年，新教教會在五口設立的女學至少有十二所。^{（12）}

1860年結束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使中國的通商口岸有了更多開放，中法《北京條約》的簽訂使教會人士可以自由進入中國的內地租地建屋。教務隨之有了急遽擴展，教會女校也呈現出了階段性的發展，其前後軌跡判然可辨，與前此有很大不同，可以看作是教會女子教育在華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下面擇取若干重要指標以作比較分析。

校舍設施。早期學校的設施十分簡陋，有些甚至連基本的辦學條件也不具備。如“毓英”在開辦時居然沒有自己的校舍，祇得借用別地，三度搬遷，後來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一座校舍，也是“小的像蝸牛殼一樣”^{（13）}。而上海“清心女校”在創辦時也沒有校舍，祇得以創辦人范約翰（M.Famham）夫婦位於上海陸家壩住宅的一部分作為校舍，另蓋竹棚為女同學實習的場所。1863年得到西方商人捐贈舊建築林料，才開始建設校舍，捉襟見肘的情景可以想見。繼後的辦學條件卻大為改善。還是“毓英”在其五十週年校慶時，已有價值十萬美元的大型校舍四座，另有二十五畝土地。而上海“中西女塾”一次性購地就達五十二畝。一些後來知名度很高頗具規模的女校也在後一階段次第建立：1864年美部會的裨治文（Mrs.Bridgeman）女士在北京創辦“貝滿女校”；1867年美國南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South）在杭州創辦“貞才女塾”；1874年美國聖公會在武昌曇華林建立“布倫女校”（後易名“聖希理達女中”）；1890年美國監理會（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South）的林樂知（Y.J.Allen）博士在上海成立“女西女塾”，

等等。這些女校的辦學條件在當時當地都卓然超群。質量的提高以數量的增加為前提，在1900年前，中國的教會學校已經發展到幾千所，僅在教會中學就讀的“中學生”就有17,000人。他們中的相當部分是女生。到20世紀初葉，僅倫敦會在華設辦的女校就有三十八所；而美國聖公會祇是上海、漢口兩個教區的走讀女校有六十三所。^{（14）}

學制課程。早期女校的學制不固定，課程少得可憐，教學質量比較低劣。如“寧波女塾”（後更名為“崇德女校”、“甬江女子學校”），在那時是開設課程較多的，其課程也祇有識字、基督故事、數學、地理等，還有適合女童特點的女紅。有些學校整天祇能以教授學生讀《聖經》了事，使得女生們能大量地背誦《聖經》的篇章，她們能重述創世紀，從第九章跳到第十七章，并能以完美的腔調重新朗讀。

這當中，既有教學力量不足的因素，也與陳腐觀念的作祟有關。在這些學校，為了防止女生給男孩子寫情書和字條，所以祇教女生閱讀而不教她們寫作。^{（15）}19世紀60年代後，情況有了很大改觀，一些較為稱職的教員參與到學校的教學工作中來，特別是“北美學生志願傳教運動”開展以後，來自美國、加拿大等國的許多受過高等教育專門訓練的青年學生大批來華，使得中國教會學校的師資大為充實，教學質量迅速提高。倣照西方教育制度建立的學制開始初具，1896年，基督教教育學會在上海開會，會上有人對學業沒有固定年限、祇有學生進校和離校、沒有學生正式畢業的狀況提出質疑，建議各女校應該明確規定較為統一的修業年限。也是在這一年，長老會在上海辦的女塾舉行首屆畢業典禮，有三位學生，經過畢業考試得到了文憑。五年後，美以美會在鎮江的女塾也有兩個女生以甲等的優異成績順利畢業。這是在華教會女校較早舉行的兩次畢業典禮。課程的設置也趨於正規，課程量大增加。據資料記載，即便到了19世紀80年代，絕大部分的教會女校也還祇能開出道學（專講聖經和耶穌故事）、國文（中國語文）、世界史地、數學四門課。1883年後有少數學校加了英語課。但是到了1900年，有人就華南、華中、華北、華東的五所美國教會辦的女校課程作了調查統計，發現她們的

課程門類有了驚人的增加，其中國文、道學、世界史和地理是所有學校都開設的，另還有四所學校開設了音樂、生理、天文等課，甚至有一些學校開出了物理、化學、動物學、植物學等課程。另還有縫紉、烹飪等適合女孩特點的輔修科目。⁽¹⁶⁾門類不少，甚至不亞於今天的初中級學校開出的課。不用說，其中的相當部分在中國都是新課。在教會女校引介的新課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體育，在上列五校中，有四所有“體操”，可見，體育課的設立在當時的教會女校中已比較普遍。中國傳統文人們的“修養”偏重於“文靜”的一面，講究琴棋書畫的“雅興”，強身健體的體育課在男性中已是新鮮，遑論女子。教會學堂將體育課導入中國，增強受教育者運動的一面，況味不同，功德匪淺。1915年，教會甚至還在上海創建了“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體育師範學校”，是中國最早的體育專科學校之一，旨在女青年中培養體育師資，為中國傳統士道所難以想象。師資的培訓是一方面，恐怕意義更大的是在社會風氣的拓開方面。

學生來源。早期招生甚為困難，生源極不穩定。如“文紀女塾”，即後來在滬上享有鼎鼎大名的“聖瑪利亞女校”的前身，首屆祇招到八個學生。而“毓英”在創辦的第一年乾脆祇有一個學生叫黃暉欽。⁽¹⁷⁾早期的生源且多來自貧寒人家和收羅到的孤兒乞丐，如“貝滿”最早的生源之一就是在大街上乞討的三個女孩，“她們後來都成了貝滿學校的骨幹”。這些人要麼是孤苦無靠，要麼是抱有一種“吃教”心理，早期教會女校為了招徠學生，均為免費，甚至還有向學生家長提供每天五至十文錢津貼，以彌補女兒不在家助理家務時所受的“損失”，有些貧窮家庭希圖省下女兒的養育費用，還能夠為家庭帶來一點收入，所以不顧社會的歧視入教會學校。到了稍後一個時期，教會女校培養出來的學生開始有了用武之地，有些學生當了女傳教士，或者是教師、護士乃至校長，她們有了較好的收入和較高的社會地位，給許許多多的父母樹立了榜樣。很多有文化的年輕小伙子也願意娶一位受過教育的女孩，那些舉止文雅，談吐得體，會唱歌、彈鋼琴甚至懂英文的教會女生在城市的婚姻市場上十分搶手。求婚者對她們的稱呼也從過去的“某某的

女兒”變為“某某小姐”，她們有了獨立的人格地位。而依賴教會的幫助赴外留學歸國的女留學生更是成了眾望所歸的女傑，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19世紀晚期美國著名的來華商人立德的太太（Mrs. L. Archibald）在她的考察中記錄了在江西九江遇到的兩個被教會送往美國留學的女醫生石大夫和康大夫，她們在美國以優異成績獲得行醫資格後回到故鄉，兩人行為優雅，愛好園藝，能操流利的英語，立德夫人認為她們已經美國化了。⁽¹⁸⁾在榜樣的昭示下，教會學校的生源逐步有了改變。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教會女塾的招生已不再是難題。一般民眾都放心地把女兒交給教會女塾去培養。有時，學校還要因為學生太多而無法全部收錄，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徒的子女每每享有優先權。教育已演變成權利而不是義務。晚清科舉時代，教會女校之所以能夠獲得比男校更快的發展，原因之一便是舊時代的中國男子最優選的人生途徑是“學而優則仕”，舊學的私塾書院比新學的教會學堂在應付科考方面無疑更有優勢，因此對優秀男生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女性本來就被排除在科場之外，進入教會學校幾乎成了她們唯一能接受正規教育進而改變人生道路的良機。所以，在1905年清朝廢除科舉制度之前，教會女校反而比男校更易獲得優秀生源。學校免費津貼的辦法也逐步取消，開始向學生收取學費，某些“名牌”學校的收費還是很高昂。上海〈聖瑪利亞女書院章程〉第十章“學費”一節的規定是：

學生修金全年應付八十四元，外加小費全年二元，……凡學生應用英文各書，並編印讀本石筆石板等項，須出資購置，……凡專習西文者，全修金一百六十八元，學琴者全年修金二十四元，外加修琴費全年四元，更須另置音樂書。⁽¹⁹⁾

如此收費標準絕非當時中國的平民家庭所能承受。收取高額的學費固然能使教會女校擺脫此前長期存在的經費窘況，減少教會對學校的經濟資助，如“中西女塾”——

其間開支之經費，久矣不仰給予西國差會，除由美差會所遣駐華使道者外，教員薪水及一切

開支均賴收入之學費為挹注，一年中不下萬金，雖時有竭蹶之虞，而量入為出，當屬裕如。⁽²⁰⁾

但由此一來，某些女校便向貴族化的方向演變，而對絕大多數的平民子女關上了大門。還是上海“中西女塾”在開辦時，僅有鳳毛麟角般的學生五名，皆來自名門富室，她們是：朝鮮貴族伊子昊的夫人，後任中國留美女生監督的黃佐庭夫人，後任青年會總理的曹雪賡的姐姐，還有其後嫁給名人的葉可良的夫人和成頌文的夫人。受教育本是天下人共享的權利，因錢財關係，而將大多數人摒棄在外，與教會的宗旨亦有不符。

立德夫人提到的石大夫和康大夫，即石美玉和康愛德，是中國早期的女留學生。換言之，中國女性留學國外的大門也是被新教傳教士所打開。

按：容闓在《西學東漸記》中記錄：最早在華興辦“澳門女塾”的郭士立夫人曾“攜盲女三人赴美”，有著述據此把這作為中國最早的赴美留學的女性。此說不確。其實，郭夫人在1839年離開澳門後並沒有去美國，而是到了呂宋的馬尼拉。

康愛德，1873年出生於江西九江，出生後兩個月被美國傳教士侯格（Hoag）收養，略長後附讀於侯格創辦的學塾。石美玉，出生於湖北黃梅的一教士家庭，早年其父在九江主持一小教堂。她在私塾學習，自幼不纏足，時人目為“怪物”。1892年，康、石二人隨女傳教士侯威（Howe）赴美，入密執根大學就讀，189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旋回國行醫，報响祖國，以高超醫術醫德享譽當時。⁽²¹⁾不過，康、石二人並不是中國最早的女留學生，現在所能考證的中國最早的女留學生是浙江寧波的金雅妹，兩歲半時父母雙亡被美國傳教醫師麥嘉締（M. Cartee）收為義女，1881年赴美入紐約女子醫科大學，四年後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成為“中國第一個女子獲得大學畢業”的人，1888年回國，為天津醫科學校的創辦人。⁽²²⁾中國的第二位女留學生是自福州教會女校的柯金英（譯音），1884年由美國國外傳道會資助赴美深造，1888年入費城女子醫科大學，畢業後回國成為福州馬可愛醫院的主持人。上面四人，便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女留學生。可堪留意的是，她們全部都是學習醫學，全部都是赴

美國留學，又全部都是得到美國差會的幫助。

三

19 - 20世紀之交，教會女子教育在社會呼應下，又由初中等學堂向高等院校發展。中國教會女子教育自此進入第三階段。1904年，貝滿女校在基督教華北教育聯合會的參與下開始籌辦女子大學。第二年掛出招牌：“華北協和女子大學”。1909年，這所大學的校門走出了中國土地上培養的第一批女大學畢業生，通共四人。1919年，這所學校的兩名女生申請考入了國立北京大學，成為中國最早的國立大學的女生，也在國立大學中開創了男女同校的新風。與此適成對比的是“蘇州女子醫學院”，1894年，蘇州基督教醫院和瑪麗·布拉克婦嬰醫院開辦醫學班，男女同在一個教室上課，聽同一位老師講授，但中間以屏風隔開，學生不能互相見面。即便這樣，也有社會壓力，1901年女學部祇好單獨開辦，稱“蘇州女子醫學院”，招收的學生很少，1919年因經費不敷停辦。除了“蘇州女子醫學院”外，新教教會在中國還設辦了另兩所女子醫學高等教育機構。它就是1899年由美國長老會創辦的“廣東女子醫學堂”，中國近代女子醫學教育以該校為嚆矢。開辦時，大衛·柔濟捐獻鉅款，成立附屬醫院和藥劑學院。1901年，端拿夫人捐款興辦附屬護士學校。自此，“廣東女子醫學堂”成為一所集醫學、藥學、護理、醫院為一體的高完整的高等醫科教育機構。1905年，美人夏葛（Hackett）為該校捐建校舍多所，為表紀念，易名“夏葛醫學院”（Hackett Medical College）⁽²³⁾，學校設有“基本學系”和“臨床學系”，後者又分內、外、婦、產、兒、眼耳鼻喉諸科。學制最初是四年，後定為七年，其中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實習一年。該校1920年移交中國政府辦理。⁽²⁴⁾20世紀30年代，學院與嶺南大學醫學院和博濟醫院聯合組成“孫逸仙醫學院”，即今天“中山醫科大學”的前身。再一所是1924年成立的“上海基督教女子醫學院”，該校限定入學者必須先修完至少兩年以上的大學課程，試圖使學院保持較高的學術水準，但似乎並沒有達到所設想的水準，1929年時祇得降低標準招收高中畢業生。⁽²⁵⁾

醫學院是專科學校，繼“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之後，中國的第二所綜合女子大學是“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福建是中國基督教勢力最大的省份之一，其教徒佔中國新教徒人數的七分之一，又是美以美會在中國的開教地。1904年5月，曾在福建龍田等地辦學的程呂底亞女士（Miss Lydia Trimble）出席在美國洛杉磯召開的美以美會議，會上呼籲在中國建立一所女子大學，得到會議響應，決議組成一個委員會進行籌組。1905年5月18日，在中國美以美代表大會上，通過決議：“在中國建立四所女子大學，中、西、南、北四向，每向各一所。”

而華南地區的率先建立，並開始在“婦女外國布道會”（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和“中華基督教教育會”（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支持下為學院募捐。1908年學院開學，初為大學預科，1917年始設正規大學課程，設生物、化學、國文、英文、歷史、教育、家政、美術、體育等系科。學院懸的培養目標是：“為華南地區造就婦女宗教領袖”，故而學院的宗教氣氛頗濃，與外界聯繫不多。學校〈章程〉規定：“早晨禮堂聚會，與主日教禮拜，每生均須出席，耶穌受難節之一星期，備有特別聚會，又有查經班之組織，以供學生研究真理。”同時提倡熱愛中國的精神，學校專門成立“愛國會”，“此會之宗旨，在提倡真實之愛國，並勸人購用國貨，振興實業，每月一次赴各鄉鄰，與兒童演說愛國之理。”該校畢業生中的很多學生都從事教會工作。^{（26）}

近代中國質素最高的教會女子大學要推“金陵女子大學”，它是由美國新教差會在南京聯合創設，1915年9月17日正式開學，以德本康夫人（M.S.C.Thurston）為校長，首屆學生十一名，分別來自南京、鎮江、上海、九江、寧波等南方城市，有教職員六人，其中美國籍四人，中國籍兩人。選用的教材全部都是英美大學的教科書。1916年，美國麻省史密斯女子大學與該校結為姊妹校，並成立了支援金陵女子大學校友會，每年捐助經費。“金陵女大”於當年開始在一百六十多畝的校址上建新校舍，陸續建起教學樓三棟，另有自然科學樓、圖書館、大禮堂和室內運動館等。1919年，首屆學生畢業，共五人，為最早在中國土地上獲得

女子大學學士學位者。1925年秋，“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體育師範學校”併入該校。1936年，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三姐妹捐贈的附屬中學宿舍和校友嚴彩韻姐妹捐贈的醫院相繼落成，學校的建設更臻完善。該校素以教育質量高而著稱，第一至第四屆畢業生共33人，其中赴歐美深造獲碩士、博士學位者20人。^{（27）}

在1920年北京的國立“女子高師”完全建立之前，可以說，中國境內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全部都是由新教教會所設辦。

除了專門的女子大學外，其它教會大學也多實行男女合校。相比於當時中國的非教會大學來說，教會大學更重視女子教育，招收的女生也更多。1922和1924年的兩國統計數據顯示，1922年時中國有大學生34,880人，其中的887人是女生，佔總數的2.54%；而1924年時，新教大學的學生共有3,901人，其中的451人是女生，佔總數的12%。這兩組統計數據，因為相差兩年，未必完全準確，但基本情況或可看出。這451人的具體分佈是：在專門女子大學的有205人，佔45%的比例；在男女同校大學中有147人（金陵大學和嶺南大學首開男女合校的先聲），佔32%的比例；在男女分校（如燕京大學早期有專門的女生部）的有99人，佔23%的比例。這是教會大學與非教會大學的相對比較。對於教會大學自身來說，其招收女生的絕對數量更有驚人的遞增。1920年，教會大學的女生總人數是252人，四年後，增長為451人，增長率達到79%。1925年，又遞增到530人。而到1947年，除專門女子大學外的男女合校的教會大學中，女生在全部學生人數中所佔比例竟有高達30%（華西協和大學為38.6%）和40%（東吳大學為42.8%）的。女生幾佔中國教會大學學生人數的半壁江山^{（28）}，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於此可見。中小學方面，教會的重視態度也相髣髴，192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教會初級小學的女生幾乎等於男生人數的一半，教會高級小學的女生人數也等於男生的三分之一以上。兩者合起來，男生在高初級小學總數中佔了69%，女生佔了31%。中學生中，女生佔了17%，共2,569人，如果加算上女生人數居絕對多數的護士和師範等類學校的學生，這個比數還要大得多。相比之下，1917-1918年，中國國

立中學學生人數中，男生為69,598人，女生祇有622人。其比例遠遠小於教會學校。再舉1920年的一組數字，這年，各級教會學校有女教師3,069人（當時中國的非教會學校中幾乎沒有多少女教師），女醫生55人，畢業女護士459人，肄業護士1,707人。而這一時期，作為新教徒的識字女性佔全部女性教徒人數的41%，比例最低的省份為17%，最高的達到61%。這幾乎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比例，因為當時中國女性的文盲率遠遠超過90%。⁽²⁹⁾無庸置疑，教會給了中國女性以更多的受教育機會。

四

至此，對教會在華興辦女子教育事業的歷史，或可作出一些點評。

一般而言，教會學校代表另一種文化（主要是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它們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傳入近代的教育制度和方式，為中國引進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新學科，客觀上推動了近代中國科學的產生與進步，並對中國封建教育制度給予了摧毀性打擊，進而幫助奠定了中國近代新學制的基礎。教會學校是中國最早開放，瞭解國外特別是西方的一扇窗口，也是中國輸送留學生的最早培養基地，許許多多的中國人通過這個渠道走向了世界。教會學校還為中國的各行各業造就了一大批優秀人才，這批人才對中國的近代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教會學校還向人們展示了西方的宗教、生活、思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們價值觀念的轉變。專就教會女子教育來看，還另有一些特殊意義。出於傳宗接代、光宗耀祖和家族宗廟繼承人的考慮，中國文化的重男輕女觀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女兒身在傳統中國幾乎從一誕生就受到漠視和冷遇。女性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想要接受教育是很難的，教會卻在這方面打開了一道裂縫。在中國各地區開辦的女子學校在當地都是前無古人的“第一家”，在那些地區開了設辦女校的一代新風。不妨說，女子教育的開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聯繫到國人自辦的第一所民間女學“經正女校”，晚至1898年才出現。而到了1903年，清政府的學制仍把女子教育排除在學校教育之外，反對設立女校，致使由中國政府開辦

的女校晚至1908年才建立。而到了1909年，西安當局準備在當地建立女學堂時，也還有老學究發出開辦女學要男人們幹甚麼的質問。教會學校首先向佔人口半數的中國婦女打開接受正視教育的大門，不僅對中國教育事業，而且對近代中國的人口素質、科學文化和政治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但是，問題還有另一面，教育主權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方面，外國教會在華辦學無可爭辯地屬於侵犯中國教育權的行為，它是鴉片戰後中西交往狀況發生根本性逆轉、中外關係步入一個非正常非對等的失衡期的產物。外國在華辦校，本質上是一種強制性的文化移植，它們在治外法權的保護下，滲出中國政府的管理範圍。它們在“西學優於中學”的旗幟下，對延續了幾千年而生生不息的中國傳統文化形成全面衝擊，並使中國的民族自尊心自信感受到某種傷害。正因此理，近代中國便屢次地爆發要求收回教育主權的鬥爭，20世紀20年代，在“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民族主義勃興的背景下，發生了規模很大的“收回教育權運動”。運動幾乎席卷了中國的各大城市，在壓力下，教會學校（包括女校）有了重要改變。其一，減少了宗教類課程，宗教課由必修改為選修，是否選修由學生自由決定。其二，絕大多數教會學校都向中國政府註冊備案，在形式上接受其指導。1931年，金陵女大和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向中國有關當局履行註冊手續。因為中國政府頒佈的註冊條件規定：大學必須至少有三個學院，神學院還不包括在內。金陵女子大學祇有兩個學院，所以改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通過註冊，教會學校開始接受中國政府的某種管轄，但教會學校特別是大學往往在向中國政府註冊的同時，也繼續保留她們原來向其它國家註冊的有效性，具有雙重身份，像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都仍然保留了她們原來在美國紐約州註冊的合法性。其三，增加了中國人在教會學校教職員中的比例。這是註冊資格硬性規定的一項指標。到1930年前後，中國人在幾乎所有的教會學校的教職員中都佔了多數；大部分教會學校還讓中國人出任了校長。像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由中國著名的女教育吳貽芳女士出任校長。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由陳淑圭出任“校政委員會”主席。然而，教會學

校在中國大陸完全的消失轉型還是在1951年前後，它與當時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面對的國際國內環境，特別是中美關係的變動以及朝鮮戰爭的爆發有直接關聯。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中美兩國也進入戰爭狀態。12月10日，美國政府宣佈管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的公私財產，禁止一切在美國注冊的船隻開進中國大陸港口。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取反措施，發佈〈關於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美國在華存款的命令〉。此一來，與西方國家有密切依附關係的教會學校在中國大陸的存在，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成了問題。1951年1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長與接受外資的學校代表召開聯席會議，討論解決這部分學校困境的辦法，決定教會大學逐步國有化，由政府接辦。緊接姪，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合併組成公立的“金陵大學”；福建協和大學和華南女子文理學院也合併成立公立的“福州大學”。這些學校由中國政府提供經費，不再接受外國資助，同西方世界基本斷絕了關係，在教會學校任教任職的外國人也大多於此時返國。1952年4月6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進行院系調整，從1952年的6月中旬到9月下旬，對中國大陸既有的高等院校中的四分之三的院系進行了調整和重組。教會女子學校經調整後基本不復存在。其調整的具體情況如下：1951年時才合併成立的“金陵大學”，這時又被打散，歸併到當地的八所大專院校中，前校長吳貽芳成為“南京師範學院”的院長。而“福州大學”也改為“福建師範學院”。總之，經過1952年的院校調整，教會大學從名稱到實體都不存在，中小學也全部被中國政府接管。教會在中國大陸設辦的女學至此掩上歷史的一頁。而在港、澳、臺地區又有姪她們另外的續篇。

【注】

- (1)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p.232.
- (2)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58年，頁220-221。
- (3) 容閏：《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3。
- (4) 參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建道神學院1993年，頁29。
- (5) 麥占恩：《梁發傳》，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9年中譯

- 本，頁37-38。
- (6) S.W.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1907, Vol.2, p.328.
- (7) M.E.Burton, *The History of Women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1911, pp.34-35.
- (8) 載《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五卷第四期。
- (9) 雷良波、陳陽鳳、熊賢軍：《中國女子教育史》武漢出版社1993年，頁206。
- (10) Chindon Yin Tang, *Woman's Education in China, in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ed., Bulletin of Chinese Education*, Shanghai, 1925, No.9, Vol.2. (1923), p.3.
- (11) 褚季能：《女學先聲》，載《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七號。
- (12) 朱有璣、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77。
- (13)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頁272。
- (14) 參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1907.
- (15) E.A.羅斯：《變化中的中國人》，時事出版社1998年中譯本，頁204。
- (16) 褚季能：《女學先聲》，載《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七號。
- (17)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頁273。
- (18) 阿琦波德·立德：《穿藍色長袍的國度》，時事出版社1998年中譯本，頁286-287。
- (19) 《聖瑪利亞女書院章程》，（單行本）。
- (20) 《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17年第四期。
- (21) 梁啟超著：〈記江西康女士〉，對二人行狀述詳細。載《時務報》第二十一冊，1897年3月23日。
- (22) 董寶良：《中國教育史綱》（近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82。
- (23) *Missionary News,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Vol.40 (Feb.1909), pp.114-115.
- (24) 教育部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丙編（教育概況），開明書店1933年，頁134。
- (25) 李純康：〈上海的高等教育〉，《上海通志館期刊》第2卷，第2期（1934年9月）。
- (26)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頁595-610。
- (27)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4。
- (28) 統計數據來自徐文台：〈收回教育權〉一文，載《民鐸》第七卷第三號；另參國民政府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第五編，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2章（公私立大學概況）；再參傑西·格·盧芝：《中國教會大學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中譯本，頁127。但是，後一本書所引用的1926年出版的《教會大學手冊》所記1920年的教會大學女生人數與前兩種記述略有不同，僅為117人。
- (29)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中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中譯本，頁890-891。